

# 蘇聯託兒學校 與父母教育

董任堅譯 佛提夫斯基原著



世界書局刊印

蘇聯託兒學校  
與  
父母教育

佛提夫阿斯基

董任堅譯

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初版

蘇聯託兒學校與父母教育

實價國幣二百四十元

外加運費匯費

原 著 者 佛提阿夫斯基

譯 者 董 任 堅

發 行 人 陸 高 誼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所 版  
有 權  
不 准  
翻 印

## 譯 序

譯者以爲三民主義教育的第一步，應該着重民族主義；即兒童自出生差不多到可進小學的時候，——這一階段的教育，姑且叫它做「慈幼教育」——我們要他沒病，能夠運用身心，使用工具，而適應他自己的鄉土。這樣，我們不但在人民數量上可以增加，在人民品質上可以改進，而兒童自幼至長「食國之毛，踐國之土」，從鄉土上自然而然地發生出民族的意識來，使民族的生命得以延續不絕。假使依照這個目標去設施慈幼教育，我們便不得不把小學以前，即所謂校前（Pre-School）一階段教育組織起來，認它作學校系統的一環；不但保育院，嬰兒院，託兒所，幼稚園的數量須得大加擴充，而一般幼稚師範的課程亦應該有一種澈底的修訂。那些兒童的訓練如串珠子，剪紙，唱毛毛雨一類歌曲的活動，須得重行估價了；如兒童的檢驗，營養，飲食，排泄，休息，睡眠，衣着，以及父母的婚姻，生育，衛生等指導，或父母教育，爲保護身心方面應有的活動了；又如觀察，遊戲，節奏，舞蹈，表演，歌唱等對於身心的運用，如寫法，讀法，算法，唱遊，美工，科學，運動等器具對於工具的使用；如故事，常識，節宴，展覽，旅行，參觀，集團訓練，對於鄉土關係的發生，均不得特別注重，亦爲慈幼教育的要素了。

國外的慈幼教育除美國在教學研究實驗方面頗多供獻外，蘇聯的特別在普及方面，尤足為我國設施的參考。蘇聯地廣人多，而各處又民性不同，風俗互異。它設施的教育，就是在慈幼教育階段裏面，亦未將教育的整個性（Unity of Education）與教育的一致性（Uniformity）混為一談。僅僅在教育的最終極目的與精神上加以「集中」而變化參差，在在都是，如各地遍設慈幼保護院，並為適應地方的需要而研究各地方的材料與問題，便是一例。我國自七七事變以來無論城鄉，不乏慈幼組織，如保育院，如街童班，惜大都為救濟目的，少普及計劃，師資訓練尚未注意及此，專才奇缺，研究實驗，更談不到。因於課餘述評是書，以為提倡慈幼教育的一助。

本書第一第二章由孫君婉華執筆，已在小學教師發表，第十二章及附錄一，由胡君冠羣執筆，已在中華健康雜誌發表，全書又承胡君繕校整理俾得早日藏事，謹此鳴謝。

董任塵

民國三十年十月

## 原 序

這本書的目的在供給讀者一個蘇聯託兒所工作的寫真。它的主题是教育工作。我們現在都覺得兒童期裏初期生活的重要；他有許多的動作協調與技巧在那時習得的。他的理智興趣與情緒態度又在那時爲人引起了而加以指導的。這些，再加上從正常的社會順應所發展出的人格特性，便立定了一個兒童品性的基礎。

我們知道一個環境能夠鼓勵這些反應，而使它對兒童發展時期適應得很良善的，在生活任何時期，特別當他在所謂形成時期裏，關係極爲重要。

但教育工作不應與整個生活分離的。在蘇聯教育大部分是靠著全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生活，不僅靠着國內現在所有勢力的總和與過去的一切歷史，還靠着它們對目前期望與將來改進計劃的種種關係。我們漸漸覺察了這些現象的交互作用，已經達到了爲別國所不能承襲的地步。因此，本書的主要目的雖在敘述教育工作，却是不能不對俄國十月革命後社會改造的別個因子，也予以相當注意。

所以一章專講蘇聯的立法，特別注意到保護孕婦產婦與嬰兒部分的立法。我們相信那些法律規定

了婦女與兒童權利的，多少也規定了對他們與關於他們所施的教育工作。

還有一章講到慈幼指導處的，雖然它的主要目的在增進母子的健康，而不是直接與教育有關的。不過從別一方面說，一般的慈幼指導處往往包括了教育指導；因為健全的精神高於健全的身體，我們不能不顧到這身心的交互作用。

在過去我們特別着重健全的身體對於個人心理的影響，可是現在我們也公認了心理的健康多少可以產生出身體的健康，而因此，教育工作便更加有價值了。

我們勉力使健康工作與教育工作發生密切的關係。所以最後，我們的重心便逐漸由治療移轉到了預防。這也可以說自十月革命以後，經濟與社會生活一經改造，我們對初期兒童的教育也特別地着重了。

作 者

目 錄

譯序

原序

雪兒教授導言

第一章 慈幼的保護

第二章 立法

第三章 慈幼指導處

第四章 託兒所

第五章 各型託兒所或託兒學校

第六章 託兒機關裏的教育工作（一個綱要）

第七章 一個實驗託兒所的教育工作

一一

一五

二一

三三

五八

七三

八九

- 第八章 託兒所兒童的音樂教育 一個實驗 九六
- 第九章 託兒所的設備 一〇六
- 第十章 嬰兒用的玩具（在行走前） 一二九
- 第十一章 關於慈幼的研究工作 一五七
- 第十二章 健康與教育宣傳 一六九
- 第十三章 保護慈幼應用的博物院 一七五
- 第十四章 蘇聯託兒所及指導處的結論與最近的前途 一八六
- 附 錄
- 一 中央慈幼保護院訂定的指示綱要 一九八
- 二 關於健康與教育的文字宣傳品：託兒所兒童的新主義教育 二一〇
- 三 一個指導處與一個住宿聯合會訂定的合同 二二一

## 雪兒教授導言

我們今日所居的世界，有了電報，長途電話，無線電等等已經遠遠地越過了國家的界限，使我們對地球上各國的事情自然都發生了興趣。所以沒有一個國家能夠長久地守住它的秘密，不給別人知道；它發見的政治、經濟、工業或美術的知識立即傳播四方，凡是新聞所及，似乎絕對不會受到時空的限制。在教育範圍裏，領袖們特別注意於全世界正在進行的試驗，他們都想要有一個自去觀察的機會。結果，互換教授，助學獎金均覺得非常重要。大學裏也設了有學分的教育學程，給那些已經服務過的教師想四處八方去找新的教學方法，或擴充知識界域，聘了有經驗的教授加以指導。但是他們之中能夠到法、德、瑞典、蘇俄各國去的究有幾人。編者爲了對那些教師渴望一見外國教育的實際工作而不可得，深表同情，所以有編輯本書的計劃。

一九二九年編者承蘇聯教育人民委員會委員羅那卡斯基（Anitoli Vasilievich Lunacharsky）不棄，邀去參觀託兒所，託兒學校與幼稚園。這是在一般遊俄參觀的潮流之前，當時似不免有些冒險。我們在蘇聯雖逗留不久，幸承好友佛提阿夫斯基女士（Madam Vera Fediaevsky）之助，計劃周

密，時無虛擲，不但編者個人，即師範學院其他教職同人亦在這短促期間看了學了不少。我們的經驗都似乎非常的新奇而富刺激，喘息未停，對於這新興文明不及回想，何敢妄事批判。我們當時的任務在觀察在研究一個已經改變及正在改變中的世界，身歷在這一情境，把傳統的與固有的社會組織觀念完全推翻了另事建設，真覺得目迷五色，手足無措，不論我們當時或事後對它的意見如何不同，這是我們全體所獲得一種偉大而寶貴的經驗。

在當時，在當地編者便決定了鼓勵佛提阿夫斯基女士在公餘之暇，把蘇聯託兒所，託兒學校與幼稚園的設施記載下來，貢獻給國外讀者。這種新奇獨倡的設施都是爲了要適應在城鄉農工方面工作的母親的，頗足供一般教育研究者的參考。

佛提阿夫斯基女士擔負了這繁雜的工作。她在百忙中，各處都要求她的時間，她的精力；她幫了國家創造出新型的校前教育工作，去適應各地人民與各個民族不同的需要。這當然不是複演了我們在英美所觀察到的成績可以奏效的；因爲她們的國家正在改造整個文化，把它建設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之上，那裏千千萬萬的人民語言不同，習俗不同，操作不同，各地方的需要須得研究；爲那些日夜分批在工廠裏，或者在集體農場上工作的母親們，又須得創造出新的組織。例如，一型組織，最有趣而最獨別的，是在火車站

或列車裏專爲母親與嬰兒設置的，使他們在長途中獲得了安適與便利。工人們既不能常在一個地方工作，須從一處轉到別處，有時五天，有時一星期，在火車上旅行跋涉，如要不犧牲母親與嬰兒，自應有一種組織發明了去保護他們。我們想到在我國或在別的國家，那些疲乏的母親，抱着哭泣不停的嬰兒作長途旅行的苦痛，一見這種巧妙而人道的設置，不論創造出它的社會背景是什麼主義，都值得我們深深地讚賞仔細地研究，與普遍的宣傳，我們姑且不管他們創設的動機如何，只從它的結果上看來亦不難作一種公允的批判。

一種文化，要靠了文字去解釋給別人聽，就是彼此有了共同的語言作思想的媒介，也是很困難的。再加上著作人須用了外國文字去對讀者敘述他們所絕不熟悉的文化，那是難而又難了。第一，假使我們不知道新俄所有的課程是都根據了它社會的整個政治、經濟和實業概念所產生的改變，或從那些改變發生出來的，那便不能瞭解它教育的改革。第二，蘇聯婦人的新地位要求要保護她們自己——特別在產前產後的時候——要養護她們的嬰兒，那在別的國家裏不是種類上不同，便是性質上絕非一致；因爲婦人們在她們生活中最不能自助的時候，若不享有一種特別權利，得到一種新的保障，而須與父兄丈夫同等工作，那末她們與她們的幼兒必得爲國家過度地犧牲了。我們在美國說「婦人與兒童第一」或「齒先

於美」(Age before beauty)在蘇聯却說「嬰兒與母親第一」從這樣一個特別的蘇俄境況，於是發生了新型的託兒所，託兒學校與幼稚園。不過，我們常須記得這些慈幼保護機關一方面與育兒，另一方面與母親的工作狀況都是密切相關的。例如，農工須跟着收成從一處走到他處，那些固定的託兒所便無濟於事了；它們必須設在輪上跟着母親四處流轉。至於為工廠工人設置的託兒學校，必得靠近工廠，那末乳母可依照醫師規定每隔數小時去哺乳自己的子女。此外，母親發生疾病時為她設置的一型養護，亦值得我們的研究，雖別的國家，美國亦包括在內，亦正在試驗照顧有病的母親與應付在家庭所發生別種的危機；如為稻田收割者已設一種巡迴的緊急託兒學校等。

一個人，無論他社會的政治或經濟概念如何不同，不能不承認蘇聯對它的嬰兒與幼兒都覺得是值得國家犧牲了一切去給他們最好的養護的。不過，我們必須記着，蘇聯是一個龐大的國家，人口之多，數可驚人，因此，他們已經做了許多，却還有許多未做，他們所有的兒童並沒有都能享受到最好的養護。雖他們最後的目的是要不使有一個兒童被人忽略了——換一句說，便是要給全國所有的兒童百分之百的養護——這個目的却至今還未達到。佛提阿夫斯女士一再地指出，在這時候，她並不說他們的理想已經實現；這還是他們的目的，——在他們整個經濟計劃的一部。他們是在中途，至少是在這一個方向中進行。

而她是個在這計劃中工作而向着這目的做的人。她試把她所看到的情境忠實地描述出來，以餉讀者。至於蘇聯託兒學校的全部理論與實施，從美國心理學家與託兒學校工作者的觀點看來，未始沒有要保留的地方。例如，對於教左手兒童的訓練，便有一些異議。不過，這類參差，影響甚微，當然不致動搖了我們互相切磋，善用了彼此的經驗爲人類圖謀幸福的信仰。

我們現在恐怕還很難覺察有許多地方，國與國間，爲了地理上一河之隔，一山之阻，或一種想像的界限，竟發生狹窄的國家或種族偏見——因習慣與傳說的不同，便拋棄了與別國交換教育思想的大好機會。這也是我們不能迅速改進各種教育的一個解釋。不過，我們想一個國家，能夠產生出這一位巴夫洛夫（Pavlov）的，自不但能學於人，也一定有些東西可以教人，而使我們謙願受教的。

著者與編者計劃本書困難重重。第一是語言的隔閡。因我們早主張請一蘇聯教育學者，不但對託兒學校教育，素有研究，且開始即參與改造工作的人主持其事。一方面我們未始不承認外國參觀者的觀察敘述可以比較客觀，一方面本國的作者却也有他的利便而爲國人所不可得的。

假使這書用了俄文寫成，那便發生了繙譯的問題。繙譯的人不但須兼擅英俄語言，而且還要熟諳蘇聯託兒教育，這真不易多得。幸而僑提阿夫斯基女士富於一般俄人所有的特別語言天才，寫說英語，異常

純熟，所以爲避免繙譯的困難起見，我們決定即請她用了英語去寫；同時還希望得一個不但熟悉美國託兒學校與幼稚園而對蘇聯的校前教育情形亦有觀察經驗與研究興趣的助她編輯。我們大索不得，不得已而求一擅長英文而瞭解俄人學習英語的問題的，亦未成功；因爲大都教師均不敢試改佛氏原著，致損其真，後以本書計劃，原爲編者所發起，它的材料實非常寶貴，爲我英美教育學者所不容漠視，與其功敗於垂成，不如自告奮勇，於是勉爲其難，毅然執筆。不過編者有時修改，有時竟在重寫，爲了要不失著者原意而盡力設法保存她的英語，結果，往往在一小節裏發生了兩種不同的風格，後來與出版家把這些困難討論了一番，都以爲著者的原意較英語的形式更爲重要，因爲我們要知道的是從俄國觀點寫的一種蘇聯託兒學校教育，而不必是我們自己的。但是更有一重困難：俄美相距甚遠，一小節的修改或重寫，即非經過一個月耽擱，不能獲得著者的同意。我們有時雖利用了電報去訂正錯誤，但也不能滿意，所以只得冒險進行。其中錯誤，在所不免。不但對著者的思想，甚至對蘇聯視爲神聖的政府觀念，或竟有所曲解。這種「無意的過失」恐怕由於編者竭力想把一個新世界所創造的校前教育畫情描述之故，尙希英美讀者與蘇聯學者予以原諒。如將來再版，當有機會詳加更正。

幸而佛提阿夫斯基女士所供給材料的價值，已足使編者在數千里外鼓勇邁進以底於成。女士更搜

集了一百餘幀照片圖表，以補文字說明的不足，廠家雖因此加高成本犧牲不少，而始終未有異議。這種大量，意殊可感。

現在關於著者的本身略述一二：她的經歷和她的爲什麼要給英美教師著述這書。編者有幸與女士相契至今已歷十年，回憶一九二七年女士在國際幼稚園聯合會演說的時候，彼此始得相識，當時她的使命正在研究美國的校前教育，父母工作與師資訓練，虛衷樂善，文質彬彬，而同人未得盡地主之誼，招待不周，深爲歉仄。數年後，女士乃邀同人往俄參觀，奈一時不克成行，至一九二九年蘇聯教育委員羅那卡斯基復正式加以東邀，於是使同人得慣觀光蘇聯慈幼教育的素願。自入俄境，卽承女士暨國外文化關係會（Society for Cultural Relations with Foreign Countries）殷殷款待，真是賓至如歸，非常安適，而各界領袖，亦不惜時間，盡情指示，使同人得有自由觀察充分研究討論的機會。

至於遊俄參觀同人有華盛頓教育局大衛斯博士（Dr. Mary Dabney Davis）米克（L. H. Meek）里德（M. M. Reed）斯條巫（I. Stewart）湯生特（M. Townsend）諾教授和英美加拿大，拉丁美洲，中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國的學者，亦均贊此行的不虛，對當地人士深致謝意。

編者原想把著者的學問研究，專業訓練以及她的經歷榮譽加以介紹，而佛提阿夫斯基女士來函有：

「鄙意最好把本書編著略具說明即已足當；因為讀者的興趣應是我們的托兒所與幼稚園工作而非作者本身；而且本人只是在蘇聯比較愛好，明瞭這種工作而願終身盡責於此的許多人之一而已。」不過我們覺得女士有的那種獨到的經驗，頗為一般當代教育家所稀有，因未徵得著者同意，將她的生平略傳一二如下：

佛提阿夫斯其女士年富力強，對於革命前後以及革命期中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饒有經驗，而她始終醉心在幼兒的保護與幸福裏面，她的工作就是現在也尚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之中。女士生於彼得堡舊城，即現在的列寧格勒。她是帝俄時代幼稚園倡始者的子女，所以自幼即關心兒童幸福，以此為她的研究對象，專門職業，後再在法蘭西等國進修。至一八九七年與佛提阿夫斯其先生結婚，先生是財政預算專家。女士在學術上專業上都有了充分的準備，再加三代的家庭生活經驗，固有的服務熱誠，革命之後，便一心在她自己的範圍內從事教育的改造。當時十月革命剛才結束，新政府首次承認托兒所與校前教育為國家的一種任務，給了所有的教師與工人開闢出一個新天地，使他們得到大好機會，可以利用了各人創造的能力去建設一型新的教育。女士四十年如一日，專心在促進兒童的健康，幸福與教育。她在高加索黑海區，後來在莫斯科慈幼保護院，兒童學院等擔任講師，研究專員，而教授幼稚園與小學教育頗著成效。